

王国维
鲁迅

诗学
互训

孟泽

著

中国诗歌研究文库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中国诗歌研究文库

王国维鲁迅诗学五训

孟 泽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 / 孟泽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7. 9

(中国诗歌研究文库)

ISBN 978-7-80195-714-6

I. 王… II. 孟… III. ①王国维(1877~1927) — 词
(文学) — 文学研究 ②鲁迅诗歌 — 文学研究 IV. I 207. 23
I 210. 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 第 135042 号

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

作 者 孟 泽 著
责任编辑 刘 鸿 姜逸荪 责任校对 艾 妮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中国文联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6.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95-714-6/I·380
定 价 30.00 元

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学术文库

中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比较文学与围棋文化研究中心规划项目

【王国维 鲁迅】
诗学互训
孟泽 著

作者简介：

孟泽，1963年10月生于湖南双峰。1979年入湘潭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1983年师从羊春秋教授习古典文学，1986年获硕士学位，2001年师从吴思敬教授习文艺学，2004年获博士学位。1999年评为教授。现任职于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系中国韵文学会理事，《中国韵文学刊》《新诗界》编委。出版有《中国历代狂士》（1993年）、《无我有我之境》（1996年）、《两歧的诗学》（2006年）等。

【王国维 鲁迅】

诗学互训

孟泽 著



责任编辑：刘 鸿 姜逸荪

装帧设计：金华堂艺术工作室

E-mail: jhtbook@126.com

内容提要

以《人间词话》与《摩罗诗力说》为基本语言形态的王国维、鲁迅诗学,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具有最显著的“两歧性”特征。王国维、鲁迅的诗学内部,同时存在着与他们所处时代的思想状态,与他们的文化身份相一致的“两歧性”。“两歧性”的诗学,基于他们各自的生命历程与学术历程,其内在气质与精神,有着深刻的一致性。这种“两歧性”和“一致性”所显示的内涵与张力,构成了中国现代诗学在展开过程中的基本趋势,表征着它所能够拥有的可能性范围与丰富性程度。从整体上看,王国维、鲁迅的“诗学”不是纯粹的知识之学,也并不只是纯粹的审美之学,而更接近于一种与“立心”“立人”相关、“知”“行”一体、“人”“文”共生的“文”“学”与“文章”之学。纯粹文人或学者的名号也不足以称言王国维、鲁迅,他们是抵达了现代中国精神最高点的开创性的不世大儒。

全书分为五章,加“余论”共六部分。第一章“引论”,交代“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的前提、依据与使命,对所谓“两歧性”与“复调性”加以说明,论述何以需要从“对立的诠释”走向“互动的诠释”。第二章,描述王国维、鲁迅选择文学的初衷以及他们对于文学的性质、功能与意义的基本设定,分析“意力”与“境界”、“无用之用”与“不用之用”在王国维、鲁迅整个诗学话语中的具体含义。第三章,探讨王国维、鲁迅诗学的情感底色,“人间”与“两间”分别范围了他们的思想与作为,也因此规定了他们诗学的基本旨趣,对于他们的诗学来说,情感的体验与生命的叩问具有比学理的与认知的逻辑更显著的决定性。第四章,论述王国维、鲁迅的诗学理论及其诗学实践,在何种状态与条件下,可能走向审美的倾斜与审美的异化,他们的理论与实践本身所显示的困境,这种困境的历史文化渊源及其在时代语境中的演绎与放大。第五章,探讨决定着王国维、鲁迅诗学之基本属性和面貌的文化身份与立场,他们难以逃逸的文化身份的“且介”性与话语立场的“悖论”性。“余论”则试图对王国维、鲁迅平生的“学术志行”略作申述,既达“高山仰止”之怀,且申“异史氏曰”之志。

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且介亭杂文·附记》（《鲁迅全集》卷6·213页）

可知中国总是此中国，人民终是此人民。

——1916年3月30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王国维全集书信》61·62页）



CONTENTS

第一章 引论：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的前提、依据与使命

- 004 (一)“两歧性”与“复调性”
- 008 (二)对立的诠释与互动的诠释

第二章 “诗力”与“境界”：王国维、鲁迅接近文学的初衷以及他们对于文学的基本设定

- 018 (一)“人生之第一义”：从科学到文艺
- 026 (二)“国民之首义”：种族、心声、诗歌、人格的逻辑关系
- 032 (三)“不用之用”
- 036 (四)“意力”的唤起与“意志”的解脱
- 048 (五)“无用之用”
- 056 (六)在“可爱”与“可信”之间
- 062 (七)“阶级”与“境界”

第三章 “人间”与“两间”：王国维、鲁迅诗学的情感底色

- 072 (一)“忧生”“忧世”解：忧生忧世与“担荷人类罪恶之意”
- 081 (二)“忧生”“忧世”解：“补天事业”与“忧国情怀”
- 086 (三)“祛魅”与“返魅”
- 091 (四)遗民美学：诗学变迁的情感轨迹
- 105 (五)“文章误我”
- 110 (六)“转俗成真，回真向俗”
- 120 (七)“心里受伤，永不痊愈”
- 126 (八)“欧穆亚”与屈子性情：鲁迅审美姿态的一种解释

目录



第四章 审美的倾斜与审美的异化:

鲁迅、王国维诗学的内在困境与外在困境

- 135 (一) 审美主体与历史认识主体
- 146 (二) “阳性”或者“阴性”: 作为情感与作为美感
- 161 (三) “人为美而存在”或者“美为人而存在”
- 167 (四) 以文拟人: 一种“有机主义”的审美方式
- 177 (五) 有机主义与审美主义: “无我”与“大我”
- 185 (六) 有机主义与审美主义: “永远的正义”与“诗歌的正义”

第五章 “且介”身份与“悖论”立场: 诗学与诗学之外

- 195 (一) “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
- 202 (二) “自我克服”与“自我憎恨”
- 212 (三) 文章与文学
——文体的选择与精神动力: 在审美与反审美之间
- 226 (四) 否定中的建构: 从“对立的立论”到“取消的立论”

- 235 余论 作为“大儒”的王国维、鲁迅

- 244 参考文献

- 250 有“困难”的人(后记)

第一章

引论：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的 前提、依据与使命

1946年,在鲁迅逝世十周年、王国维自沉将近二十年时,差不多已经是当时文坛“领袖”,在学术研究上也已经卓有建树的郭沫若氏,作“小论”《鲁迅与王国维》,用有点懊悔的心情(因为是在他们死后,才“后知后觉”“他们的卓越贡献”)解读、比较“在近代学人中”他“最钦佩的鲁迅与王国维”。他简单地描述了“相似到实在可以令人惊异的地步”的“两位的履历”,和“也差不多有同样令人惊异的相似”的“两位的思想历程和治学的方法及态度”,并且按照日后越来越为我们熟悉的思想逻辑,检讨了他们“不能混淆的断然不同的大节所在之处,那就是鲁迅随着时代的进展而进展,并且领导了时代的前进;而王国维却中止在了一个阶段上,竟成为了时代的牺牲”,论析了导致他们如此不可及地“悬隔”的因缘际会:偶然的人事关联与必然的思想分野,等等。郭沫若说:“假使能够有人细心地把这两位大师作比较研究,考核他们的精神发展的路径,和成就上的异同,那应该不会是无益的工作。”^①

在差不多四十年以后,郭沫若的预期得到并不完全的回应。

陈思和1987年发表《王国维鲁迅比较论——本世纪初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影响》一文,以“在王国维自沉的同一年,鲁迅却在大规模的分裂和血污中走上了与马克思主义结盟的道路”这种选择之间的歧异为论题的入口,探讨了“进化论于鲁迅,是他改造社会的一种武器,而康德哲学于王国维,却成为一种逃避社会现实的场所”,以至“王国维自康德哲学入叔本华哲学而离社会人生愈远,鲁迅由进化论入尼采哲学而于社会日近”的依据与契机^②。

陈氏对王国维、鲁迅精神历程及其与叔本华、尼采哲学关系的描述,表明近代中国社会繁复的文化思想与主题及其对王国维、鲁迅内心世界的作用,已经进入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论域,但近似于郭沫若的“两分法”的历史观以及评价标准,阻碍了他对王国维、鲁迅思想选择与生命走向作更准确更深入的“同情”和“了解”,因此在分别论析了王国维、鲁迅与西方学殖有关的迥然不同的人生历程后,也无法更多体贴他们歧异的选择与走向背后几乎一致的精神动力和价值理想。

本杰明·A. 埃尔曼在1987年中国大陆举办的“国际王国维学术研讨会”上,提交论文《王国维与鲁迅早年学术思想的对比研究》,同样显示了对于王国维、鲁迅思想动机与选择的“两歧性”的敏感,述同的目的在

① 《沫若文集》第12卷《历史人物》第5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又见《宋元戏曲史》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② 《复旦学报》1987年第3期。

于言异，他认为，在早期著作中，王国维关心的是“人生的意义”，而鲁迅关心的是“要使中国趋向一个美好的未来”，因此他们对于“天才”、对于文学、对于叔本华、尼采哲学的接受方向与方式也迥然有别^①。

黄惊涛在《臻于“悲剧”的生命与思想境界》的论文中，以学术、思想的“天下意识”与“天下观”为切入点，比较王国维、鲁迅社会承担、道德承担和思想眼界的超越性，探讨他们作为工具论与本体论的文学思想，解说“悲剧”在其思想构造中的中心意义，阐发臻于至境的美学“悲剧”与二人臻于绝境的生命“悲剧”的同构与互动关系^②，深入到了王国维、鲁迅精神世界的底里与时代语境的广大幽微处。

郭、陈、黄等的揭橥与研究，表明了有关王、鲁二氏的比勘，对于诠释20世纪中国广阔复杂的精神现象与历史现象所具有的意义和可能。作为相异又相似到“令人惊讶的地步”，其思想与精神的触须深入到了历史与人道深处的文化“行者”；王国维、鲁迅的整个学术思想，代表了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特别是中国现代诗学的“两极”，并且预示了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性。他们同样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与自觉的西学洗礼，担负着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选择的难以回避的时代痛苦（相应的是对时代使命与历史要求的敏感与承受），以及他们在所处时代与文化条件下最大限度的自我反思的真诚和力量，使得他们的诗学显示出充分的创造性与罕见的思想强度。他们的诗学与不止于诗学的学术实践，不只是他们的个人体验、思考与信念的体现，同时联系着广大的社会场景与公共空间；不只是自身生命的注释，也是时代理性的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诗学正是进入他们整个学术思想与人生践履的“不二法门”。

作为两个具有“对立”和“对照”意味的“文本”，内涵了王国维鲁迅平生学术志行和精神世界的“诗学”，在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与理论旨趣上呈现出鲜明的“两歧性”，这种“两歧性”所显示的内涵与张力，构成了中国现代诗学在展开过程中的基本趋势，表征着它能够拥有的可能性范围与丰富性程度。两歧性的“诗学”，基于他们各自的人生历程与情感历程，其显著的异质性面目下，存在着内在气质与精神的深刻一致性，而在时代及文化语境变迁中，它们所彰显和可能彰显的高下之分与是非之别，往往富于“戏剧性”。这同时表明，王国维、鲁迅及其“诗学”的复杂性格与内涵，有着远不止于它们自身的解释价值和解释空间。

① 《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之三，第404页，吴泽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② 黄惊涛《臻于“悲剧”的生命与思想境界——王国维、鲁迅生命历程及思想取径的并置研究》，未刊，湘潭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

（一）“两歧性”与“复调性”

“两歧性”是张灏在《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中使用过的一个词语，他所说的“两歧性”是指：“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主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诅咒宗教，反对偶像，另一方面，他们却极需偶像和信念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饥渴；一方面，他们主张面对现实，‘研究问题’，同时他们又急于找到一种主义，可以给他们一个简单而‘一网打尽’的答案，逃避时代问题的复杂性”^①。张灏用“两歧性”概括五四以及五四思想与知识者所表现出的精神特征。此种“两歧性”的精神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表述为“复调性”，其本质与根源在于近代思想文化的两歧、矛盾与分裂，即总是有不止一种音色、一个声部或旋律，伴随着每一个正在展开的思想文化主题，这些不同主题又构成更高的整体主题的“两歧性”或“复调性”。

西学东渐以来，直到新文化运动之后，个人、民族、国家、世界（相应的是关于民族身份与个人身份，国家意识与世界意识的认知与认同），处在重新定义和定位过程中，器物、制度、观念，一切都在改变、重构、新建。目的与手段不能相属，“知”（认知）“情”（认同）不能统一，“通”“权”之间难以把握，自我确立与自我清算，并辔同行。既要保存又不得不改变乃至放弃自己固有的文化身份，既要尽量唤起又要尽量消除自己的传统文化记忆，既要在人的与文化的有机整体性构成中，分蘖出独立的个性与个体性，又无法不把这种个性与个体性纳入有机整体性的社会实践与历史使命之中。经验的还是情感的，主体燃情的还是客观理性的，肯定还是否定，有所依托还是放弃羁绊，历史纵深的还是现实平面的，统一凝聚的还是分散博弈的，迎纳还是拒绝，非逼迫的对话还是逼迫的对话……无限多又无限少的选择及其合理性，撕裂着近代知识者。

笼统言之，伤筋动骨的家国，百孔千疮的时代，堆积着不止一个问题、一种主义，而且，理性有不止一股源头（至少包括工具、功效理性和价值理性），社会与个人生命却只有一条河床、一个舞台，覆水难收，没有可逆

^① 《张灏自选集》25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性^①。因此，每一步都如同生死当头，每一种选择都险象环生，举足、失足都不免酿成千古之爱恨、千古之是非。同一条河床里，清流浊流，翻江倒海；同一个舞台上，刀枪剑戟，载歌载哭。

包括王国维、鲁迅的选择与言说在内的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特别是诗学，正是在此种充满紧张与危机感，充满矛盾性的两歧与分裂中展开并获得实践的。不仅认知与审美、理性（功利）与感性（诗性）、私人性与公共性、古典血脉与现代情怀、应然（理论、概念、“知”）与实然（实际、实践、“行”）难免冲突，这些元素的内部指向，也常常构成对立。

按照最一般的表述，王国维与鲁迅，在人生取向、思想依归、家国情怀等方面，不同到几乎背道而驰。鲁迅、王国维个人，在肯定与否定、认同与批判的取舍之间，同样不乏面对“悖论”的痛苦、怀疑与尴尬。王国维以审美求解脱、求慰藉，一路由哲学义理的究诂，由审美的解说与文学的书写，退而从事“实证”的“经验”的学术；鲁迅立志感召、吁求抵抗，一路由翻译、小说进到杂文——所谓“匕首”“投枪”的战斗。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国维的诗学是从“己”出发的，以对于生命的慰情为最高宗旨；鲁迅是从“人”出发的，以对人生社会的观照为重心。王国维早年标举的是“出家人”的美学，以审美超拔意志和欲望，“忧生”；鲁迅标举的美学是“干世者”的美学，以文学进入“生杀爱憎”的“实人生”，“忧世”。由此构成了他们的诗学“两歧性”的基本面貌^②。

不仅如此，王国维曾经所强调的近乎“绝尘”的独立审美与他把“美术”最终纳入“文”“学”的“知行一体”结构，鲁迅对于文学的反“实利”的认知与实践中的明确的功利诉求，同样表现出近乎对立的判断与选择，证明其诗学内部同样存在着“两歧性”与“复调性”，存在着基于各自生活实际与文化实践要求的“歧异”性甚至“悖论”性。“人”“文”同构，“诗”“学”一体，在他们深层的人文理念与紧贴现实的手眼中，审美不仅指向泛审美，审美的动机与动力也无不联系着泛审美的动机与动力。

自然，王国维是不止“忧生”的，“忧世”同样是他的生命底色，20世纪初沉溺哲学与审美时近乎“遗世独立”的风采，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超拔

① 参见朱学勤《启蒙三题：笑着的、叫着、哭着的》《为什么要对比研究文化革命与法国大革命》，《风声雨声读书声》103-133页，三联书店1994年。

② 木山英雄在《“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一文中曾谈及周氏与王氏“文学”观的区别说：周氏的“反功利主义是为远大的功利服务的。而王国维所追求的，是以席勒美学的‘游戏’为极致的、于己是对深刻的灰世主义和忧郁症的直接慰藉的纯文学”。见《学人》第10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又见赵京华编译《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第224-22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于所置身的现实与人文传统,超越他“准士大夫”的社会身份与文化身份,放弃“干世”的热情,而恰恰相反。鲁迅也不止是“忧世”的,其“忧世”的深沉正是得力于他“忧生”——生命体验与审读的细致精微,他是从几乎“出世”的精神边缘来感受和观照时代、民生、世事的中心主题的,他是从绝望中方才有所指望的。

事实上,王国维原本“忧世”,鲁迅从来“忧生”,他们的诗学有着几乎相同的生命依据,这一点从他们对叔本华、尼采的接受可以见出:王国维从叔氏唯意志主义的哲学与强调纯粹直观的美学中,获得“开悟”人生的契机,寻找最终落入空虚的关于审美慰藉的立论,但也并未走向完全的虚无主义。对于王国维来说,学术转向既出于偶然,更出于必然,自沉是怀疑的极端,也是信仰的极端。

鲁迅一直以尼采氏召唤的“意力”抵抗虚无,认同“在强有力的憎恶后面”有“更强有力的爱”的“虚无的抵抗者”,对尼采“超人”义理的演绎有清醒的属于自己的定见:“尼采教人们准备着‘超人’的出现,倘不出现,那准备便是空虚。但尼采却自有其下场之法的:发狂和死。否则,就不免安于空虚,或者反抗这空虚”。鲁迅反抗空虚也反抗一切权威,似乎“一无所信”,却决非“无所不为”,更否定“以一无所信为名,无所不为为实”的无状无耻^①。他们的所感所思出于“诚”“心”,“以光曜之发于心故也,以波涛之作于脑故也”,所抒所择出于“充实而不可自己”^②。而且,他们讲究的是“第一义”,是“确固之崇信”,“作始之”“知识”^③。

王国维短暂地停留于审美的自慰,而最终不得不告别和出走;鲁迅则早早警醒于审美自慰的空虚,决然地放弃了对于自闭自足的审美“和谐”的任何指望,最终驻足于与时代、社会的具体“应对”(清理、揭发、检讨、批判)中。他们共同出离了“浪漫主义”,出离了“文学”,以对于“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经验”的具体索解与批判作为心灵的出口,以“无解”作为解答,以怀疑的力量抵抗简单的归依与信仰,以具体的充满矛盾的社会性寄情,缓解灵魂深处的孤独与“孤立”。

叶嘉莹曾经认为,王国维是所谓“‘知’与‘情’兼胜”的人^④,而许寿裳说:“鲁迅之所以伟大,就在他的冷静和热烈双方都彻底”^⑤。如果“冷

① 《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卷6,第2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作于1935年3月2日。

② 《破恶声论》,《鲁迅全集》卷8,第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③ 《鲁迅全集》卷1,第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

④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⑤ 《鲁迅的生活》,见《挚友的怀念》第9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静”意味着理性、知性（“知”）方面的优长，“热烈”意味着不缺少感性与激情（“情”）的话，那么，由此也可以说，王国维、鲁迅既能“察”，又能“兴”，既能思辩，又能抒情。

王国维曾经自述作为诗人则情感苦寡；作为哲学家则情感苦多——“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情感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①，这当然是对于自身气质的分辨与确认，同时也联系着他的使命、抱负与胸怀。他在各种身份之间的游移，与鲁迅在不同文体之间的游移一样，宽泛一点看，王国维也游弋于不同的写作，鲁迅的身份也是在反复取舍和具体遭遇中确定的。这种“游移”，意味着现实关怀的不同策略与方式，意味着对于自身“知”“情”性分的不同取用。“诗性”的扩张与“理性”的扩张，不仅有着一致性（表面看来是十足对立的），而且它们是近代启蒙语境所同时召唤的。因此，王国维、鲁迅之“不能”成为“完全的”诗人或“纯粹的”学者（或者说，他们既作为诗人又作为学者），与其说是他们性情中“知”“情”兼胜或“知”“情”相碍，还不如说是历史对于他们的借重与文化对于他们的决定^②。

王国维一生，大体上辗转出入于求真的学术、审美的“文学”“美术”与道德关怀之间。鲁迅的一生，同样如此。王国维由道德关怀而审美而学术，在不断的自我转移与“否定”中，调整自己面对并且感应眼前世界与苍茫历史的姿态与方式，也以此安顿生命、处置自我。鲁迅早年受科学洗礼，转而希望通过审美的文学补助道德之救赎，期间又清理历史文化资源，以毕生之力跋涉于三者之间。

自然，对于他们来说，求索方向的转换并不表明全部价值理想与关怀的转换，他们的一切批判与自我批判，与其说是断“根”之举，还不如说是寻“根”之策，这是由他们的心性、初衷与识见所共同决定的。即使从事于

① 《自序二》，《静安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册五，上海古籍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1983年。

② 关于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的“文人气质”，在此可以找到某些解释。当代学人考察与反思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选择与取向时，或者不满意于尤其为“五四”所彰显的由制度变革走向文化变革的倾斜，对其中思想者乃至整个时代潮流所透露的“文人气质”多所诟病。对于“文人气质”可能或已经导致的非启蒙、反启蒙性，持谨慎的批判，在或一层面是合理的，但毕竟有以效果范围历史的“事后诸葛亮”之嫌（而且仅仅是眼前的效果和理性），废名在三十年代就在《〈周作人散文钞〉序》指出过：“所谓新文化运动，其实就是新文学运动，而这个新文学运动”甚至就是“白话文学运动”“那时的新文学运动是一个浪漫的运动，这是当然的，大凡一个运动的开始恐怕都逃不了一个浪漫性”（见止庵编《废名文集》115、118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从历史的当事人的心路历程看，其中的必然性甚至不是当事主体所以可以轻松分辨、驾驭和取舍的，事实上，历史当事人曾经从学业、职业、志业取舍乃至价值取舍上，就很少有不以远离“文人性气”自命自期的。鲁迅之屡屡声讨“文人”“文摊”，王国维之终于离开“文学”，虽然不能等义于此，但也未尝不可以从中嗅出某种反“文人气质”的蛛丝马迹。不要做“文人”，而不能免于被指为“文人气”，此中“悖论”，不可简单处置。

实证的学问,以求“可信”,也“不仅只是由于一般人所共见的精严的理性的思辩而已”“更有超越于精严之考证以外者”,“使其不断有惊人之发明和创见的,则是他所禀赋的近于诗人的感性和资质,以及他对于‘可爱’之追寻的一种理想”^①。最“学术”的关注,也渗透着他们那种已经融入血液的感怀、寄托与诗人性情;最超脱的审美规划与设计,也无法不充满现实的“是非”并且归结于对这种“是非”的理性澄明。

这正是“两歧性”与“复调性”的题中之义。

(二)对立的诠释与互动的诠释

王国维的诗学是20世纪相对被“压抑”的一翼,几乎没有作用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文学主流,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至少在“国共分治”后的大陆范围内是如此)。王氏自身在辛亥事变之前已经开始的转向^②,也表明其早期有关“美术”的界说在当时语境中的“异质性”,不仅对自身性命的安顿不能收长久之功,更重要的是对于作为整体的精神家园有瓦解涣散之势而缺少凝聚建构之力(知识谱系的拆解重构,与整个历史谱系、现实制度安排以及个人与社会精神秩序的重建是一体的)。王国维最终更加接近了“兴、观、群、怨”的传统诗学理想与写作策略^③,可以说明的不只是王国维的“蜕变”,而内含了更多值得诘难的隐性主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国维早年的诗学与美学,在大陆被“重新发现”并被诠释成为20世纪中国难得地具有审美独立的自觉要求,具有“唯美主义”“生命主义”取向的重要的诗学与美学资源,以之为世纪初的“空谷足音”,乃至整个世纪潮流中的绝响。

与此相对,鲁迅的诗学选择在20世纪几乎成为“主流”,或者说被主流所沿袭、引申、放大,特别是那些与意识形态环境的紧迫性相适应、相一致,有着很强的策略性与修辞性意味,很容易被“偏至”的社会实践所接纳的文学诉求,在很长时期内,成了文学实践的普遍纲领和主义。而其中有关文学的本原与本旨的揭示,反而被冷落,属于鲁迅个人的特殊的诗学立场与逻辑前提被遮蔽。对于鲁迅的质疑,则包括了更多对于他的精神取

① 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5、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② 1912年流寓日本,说是“尽弃”早年所学,“反经信古”,以维护“三千年教泽”自命,活出自罗振玉口中,未必完全可靠,但方向上确实吻合了王氏日后的选择。1923年编《观堂集林》,即不收早年《静安文集》中的篇什。

③ 佛雏说“……感时伤遇,友朋唱酬,以至宫廷(被废黜的溥仪小朝廷)应制,时有诗文之作,亦不能不涉及他的美学观点,大抵康、叔余影仍在,道家而外,前期曾被她非难的儒家诗论,如‘征圣’、‘宗经’、‘诗史’、‘美刺’等,又转而成为王氏之所依据”。见《王国维诗学研究》第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